

韩柳与唐代古文运动新论

郭新庆

(中国柳宗元研究会, 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 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唐代古文运动,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文学运动, 但实际上它与当时的政治革新运动密切相关。韩柳二人对“儒道”的认知不一样。韩愈创立了道统说, 确立了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柳宗元主张“大中之道”, 开创了唐代以来政治思想的新纪元。从文学上看, 两人的文论思想和文学实践之路也不相同。但他们都反对和批判魏晋六朝以来的骈体文, 并共同开创了秦汉以来古文运动的新局面, 致使唐代文学园地百花开放, 精彩纷呈, 以至影响宋代以后的诗文发展。

关键词: 韩愈; 柳宗元; 古文运动; 骈体文; 以文为诗; 以议论为诗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219(2024)01-0022-08

“古文运动”与“永贞革新”是中唐时期的两场革新运动, 一为政治, 一为文学, 其实质都是源于改变当时衰微时风所引发的。历史上文人以古文称谓家派的, 始自唐代。这里所说的古文不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字, 而是一种文体, 即秦汉时流行的古文, 也就是后人说的散文。《礼记·檀弓》上说: “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1] 这是说仲子办丧事依照古人的习俗。而为文之道,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 “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 自然之道也。”^{[2]19} 这是从本源说文起于道的意思, 可他并没说明道为何物。后来一直有人在谈论文道之事。到唐代, 陈子昂、独孤及、柳冕、梁肃等人也是这样, 但他们都没有像韩愈柳宗元那样旗帜鲜明地说清楚所主张的道是什么。

一、韩柳对道和骈文的认知不一

韩愈主张道统说。他说的道统, 按儒家的说法是指圣道承继的统系。韩愈根据佛道的传承体系创立了儒家的道统体系。《昌黎文钞·原道》

说: “斯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 舜以是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 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3]447} 韩愈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是一脉相承的, 可到孟子以后中断了。韩愈以道统传承人自居, 他推崇西汉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杨雄, 主张以文载道, 行孔孟的仁义学说和思想。韩愈打着“文以载道”的旗号, 为文气势磅礴, 可他追寻的思想却是保守的。韩愈思想沿袭旧说, 除了讲天命论和等级制外, 没有自己什么新的东西。细究起来, 韩愈排佛也是这样, 他沿袭前说, 从维护封建道统制度出发来说事。韩愈《原道》说: “是故君者, 出令者也; 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 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也。君不出令, 则失其所以为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 则诛。”^{[3]446} 韩愈把孔孟思想归结于此, 显然没有进步性可言。韩愈《与孟尚书书》说: “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 而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他发誓“始其道由愈而粗传, 虽灭死万万人恨。”^{[3]105} 韩愈排佛说佛教不耕而食, 不织而衣。到唐代佛教已与士农工商平分社会, 直接威

收稿日期: 2023-02-25

作者简介: 郭新庆(1949—), 男, 辽宁大连人, 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为柳宗元。

胁皇权的统治。韩愈《与孟尚书书》说：杨（杨朱，目无君上）、墨（墨翟，目无父母）交乱，使人几于禽兽；而“释老之害，过于杨、墨”^{[3]105}。韩愈排佛，与周围人鼓动有关。张籍曾两次上韩愈书，力言老释之害，劝韩愈“嗣孟轲杨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韩愈“信道笃”，可并未像柳宗元那样深究其理，也没对儒道创立出什么新说法。韩愈的道统说没有自己什么新的东西。苏轼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然其论至于理而不能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4]145}

柳宗元“文以明道”与韩愈“文以载道”，虽仅一字之差，可所说的道不同。柳宗元是思想家，他对儒学的研究远甚于韩愈，其思想范围比韩愈广阔深厚得多，他们对儒学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柳宗元一生遭贬，远离权力中心，他往往以叛逆者的形象发声。柳宗元坚守的“大中之道”与韩愈的儒道不是一回事。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我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谬。以为僂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5]506}柳宗元的道与当时大多数言道者不同，那些人说的儒术，拐弯抹角，漫无边际，让人看不懂；其离奇狂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恍惚惚，不知说了些什么。柳宗元身处蛮荒，形同囚徒，已无法施展他的大中之道，只能著书立说，以文明道了。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5]508}柳宗元说的道是以辅助时政、惠及百姓作为根本宗旨的，也就是他说的“利安元元为务”，这显然与韩愈说的道不一样。

古文运动从表面看，是以反对骈体文和南朝言之无物的散文而掀起的一股回归秦汉文风的复古运动；而从思想层面看，它其实是一场儒学的复兴运动。到中唐时，经韩愈、柳宗元的倡导，并率先实践和创新，使古文运动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对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为挽救文坛和社会的颓势也曾有人尝试过创新古文，可都因不具有这种能力而作罢。柳冕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说：“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未由也已。”而柳宗元做到了。唐人论文，分文与笔为二事。赵璘《因话录·南部》下说：“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刘禹锡《祭退之文》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6]这是说韩愈能文，刘禹锡善论，韩与刘对阵，无不败北。笔是一种书写绘画的文具。用之书写，记事成文，亦谓笔。《史记·孔子世家》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7]1944}这里的笔，也就是后人对古代散文的称谓。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2]19}无韵之笔的散文，和有韵之文的诗赋，各有其长，运用得当都可载道明道。但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对文学样式更是这样。骈体文到唐时已存续了二百多年，其间显然有它的道理。古文质朴，可上古有的古文已经死亡了，也不适宜千篇一律地拿来用。批判继承是常理，可一概否定也是不可取的。《柳集》里除表状外，收文章有350多篇，其中骈文有35篇，占十分之一。柳文里有不少骈文的影子。战国时百家争鸣，处士游说，辩说横议，无所忌惮。诸子为文，深于比兴，用韵用典，文采飞扬。不但老子这样，荀子、庄子也都如此。当时诸子的文章骈散相杂，韵散相兼，古时为文毫无禁忌。而通篇皆骈的文式，全篇用韵的辞赋，是后世才有的事。任何事情极端化就走向反面了。柳宗元擅长韵文，他对骈体文的态度是可取的。柳宗元精通韵文，他创造了有唐以来骚赋无人能及的高度。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起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的骈文也是一种韵文，是由辞赋逐渐演变来的。骈字的本意，是两马并驾一车。引申出并列、对偶，用之为文，称骈文。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称骈体文为“讹滥”，所谓讹是追求诡异新巧，指颠倒字句，违逆古文；而滥是说浮靡。这是说骈体文的讹滥的文风把文章创作引入了歧途。但骈文并非无可取之处，骈体文虽不善于叙事，可它声韵并茂，讲究对称美，其文采华丽，有声有色，很适宜渲染煽情，对文人很有吸引力。骈文到唐代时走进了死胡同。柳宗元《乞巧文》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这种单纯追求韵律，空于形式的骈文，到柳宗元时已成了“夸谈雷吼”，“使甘老丑”的东西，被时人讥笑为靡靡之音。可骈文作为当时的官方文字，不论是朝廷的文告，还是官府的文书，都是用骈四俪六形式书写的。柳宗元以后的令狐楚、李商隐都是写骈文的高手，此风一直延续到清代。

唐代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但柳宗元对之持较温和的态度，并非一概否之不用，而是化腐朽为神奇。《柳集》里以骈文标目的，有十几篇之多。《南霁云睢阳庙碑》是最出彩的一篇。此文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是姊妹篇。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韩愈与张籍读李翰《张巡传》，“韩以文章自名”，作《后序》，这是一篇传论体。元和三年，柳宗元应南霁云儿子南承嗣之请，作上文，并有别于韩愈用韵文骈体。两人都记张巡、许远、南霁云守睢阳的事，也都为其正名。虽文笔不同，却如比翼双璧，文采飞扬。当时睢阳只有守兵近万，却御敌十三万，达九月之久，城陷时三人都被害了。但此举却奠定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基础。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说：“守一城，捍天下，一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3]545}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赞曰：“睢阳所以不阶王命，横绝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者也。”^{[5]85}柳宗元用韵文为烈士作碑，其典雅气势可彰，其胸中之愤得发。骈文典重，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一篇千字碑文，按世采堂本标出的用典注解就有四十余处。读

过，让人有些目不暇接的感觉。可细品起来，韵味无穷，又读之上口。每一用典，都不是硬塞进去的，而是恰到好处地融在语境里，加之音韵唱和，使文字更鲜活，形象更亮丽，文章更有风采。有些东西，看怎样使用，放在什么场合，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模式。在中唐以后，能如柳宗元那样使用骈俪，恐怕还没人能出其右。杜甫有一篇《戏为六绝句》的诗，是作文艺术批评的。杜甫是诗人，他不赞成一味贵古贱今，尤其是全盘否定韵文骈俪。诗其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里的王杨卢骆，是唐初的所谓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都是写骈文的高手。可他们除骈文外别无所能，与柳宗元不可同日而语。杜甫认为，四杰的为文是初唐那个社会的“当时体”，不能一味“轻薄”地讥笑它。直到清代，还有个叫李兆洛的人，编选《骈体文钞》三十一卷，给世人看。柳宗元反其道而行之，用被世人看轻的骈体著文，反倒写出惊俗的华章来，让从不容人的韩愈也折服再三。

二、韩柳的文论思想亦不同

对于文的起源，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天地并生者，自然之道也。”^{[2]19}韩愈对文的产生，有一句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不平则鸣”。他在《送孟东野序》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3]313}韩愈这里说的“不平则鸣”，直接来自生活的穷困。他二十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常靠向人讨食过活。韩愈年轻时官场不顺，科举屡试不中。为官后又遭贬罚。晚年他谏佛骨还险些丧命。于是他作《进学解》以解嘲。作《送穷文》以自谑。他文中说穷鬼五个，即智穷、学穷、文穷、命穷和交穷。韩愈仕途失败，文誉也不佳。他生前并不像后来那样受人待见。他在《答李翊书》说：“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3]182}正反映他文誉的穷厄。就是到晚年他也没脱此穷境。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说：“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益

困。”^{[3]73}韩愈这个人，性格很强势，可许多时候却越挫越勇。他为文不平则鸣，而愈不平，其为文愈善，也就是说“文穷益工”。不平则鸣，文穷益工，这是韩愈文论的主色调。

柳宗元与韩愈不同，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说：“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5]551}唐时骈文盛行，韩愈逆之倡行古文，“弃俗尚而从于寂寞之道”，境遇是极其痛苦的。韩愈《与冯宿论文书》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3]172}韩愈曾因作《毛颖传》讽世，广遭人攻击。而他违心写骈文从俗却受人喜爱。与一般俗士相比，韩愈是一个有绝大抱负的人，在充满俗气的社会，他为志不得行而苦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韩愈引《礼记·中庸》说：“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耳。”意谓即使后世圣人复出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面对鬼神他也不怀疑。韩文大都是不平之文，是文穷益工之作。这是韩愈文论的主旨和核心。

韩愈主张文和道的统一，认为文自传道，道对文起决定性作用。他《答李翱书》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惟陈言之务去。”^{[3]181-182}韩愈排斥孔孟以外的其他思想。韩愈的思想面很窄。后来韩愈受柳宗元的影响有了转变。他在《读墨子》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3]557}韩愈认为，欲作古文，必先明古道。而要明古道，又务去陈言。他主张为文要“出入仁义”。他在《答刘正夫书》说：“师其意，不师其辞。”^{[3]176}说词必已出，文从字顺。即主张为文时语言要创新。韩愈这里说的“陈言”，也就是他在《进学解》里说的“牴排异端，攘斥佛老”。^{[3]513}韩愈认为，文的表达是由气所决定的，也就是受精神力量的影响。他在《答李翱书》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3]182}

与柳宗元不同，韩愈不是思想家，他是文章大家，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不平之文，是随性而出的实用性“杂文”，其书启、序、碑铭、表状，也都写得气势飞扬，引人入胜。韩愈为钱曾代人作谀墓文，因利害关系，替宦官、藩镇等写了一些迂曲其辞的东西，多受人非议。

历史有时很奇特，有唐三百年，诗盛文茂，荒蛮贬境中竟绽放出柳宗元这朵时代奇葩来。宋人石介说：“李唐元和间，文人如蜂起。子厚称绝伟。”^{[8]28}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的华章，是小天地生大文章。他写的永州八记，是小景生美文。王安石说：“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8]37}清代林纾《春觉斋论文》说：“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似六朝而实非六朝；由精于小学，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读之令人如在郁林、阳朔间；奇情异采，匪特不易学，而亦不能学。”还说柳宗元至贬死，“凡诸所见，均蛮荒僻处之事物，而能振拔于文坛，独有千秋，谓得非人杰哉？”^{[8]571-572}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题下有蒋之翘注说：“森严钜丽，是大手笔。”柳宗元用他耀世的文章和诗篇，冲开了笼罩文坛的阴霾，为古文运动做了奠基性的贡献，实现了他“文以明道”的追求。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说：“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之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5]371-372}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说：“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味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故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

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为之文也。”^{[5]543}柳宗元这是说，他作文章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切忌浮夸不深刻；从不懒惰潦草为文，切忌松弛不严谨；从不糊涂信笔乱写，切忌模糊杂乱；从未持骄矜之气，傲笔视人。他沉心追求，深刻含蓄，挥洒达其明快；疏导使之通达顺畅，简洁但有节制变化；为文有激情才会写得俊爽自然，文有气势才能深厚凝重。柳宗元精通文史，博览群书。这些为文的方法和技巧，都是柳宗元用来辅之明道的“羽翼”。他在《杨京兆凭书》说：“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后代乃可知之。”^{[5]487}柳文简古，这是历来文史学者的共识。柳文如诗，他每为一辞都如同作诗一样去熬磨自己。他谈天说地，叙古论今，都是建立在通晓古今，博览群书之上的。柳宗元精通为文之道，可他从不随意立言，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今人尊奉的。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好辞工书”，即不耻那些空洞无内容的骈俪之辞。他认为，品行是为文之本，要注重道德的内在修养。他尊崇孔子，主张“读百家书”。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告诫后进，求道要“慎无怪、杂乱，勿务速显，”^{[5]548}也就是不要急于求成。而一旦得了为文之道，自然会写出内容质实，文采华美的文章来。

柳宗元终生处贬境，性情内敛；他守大中之道，为人肃穆傲然；其诗文愤世嫉俗，深沉静远。柳宗元推崇屈原、司马迁，作赋哀怨悠长，为文渊雅。他深谙为文之道，有不少论说这些问题的篇章，言之切理，情深意茂，让后来的学者受益。柳宗元《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谈为文之道说：“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5]386}这是说，为文内容和形式缺一不可。没有内容徒有外表的文章像陷阱，危害更大；而

有内容缺少表达的形式，美的东西也没法展露，只会受到唾弃，文行也不远。而要通为文之道，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专志于学”。柳宗元勉励豆卢膺“以《诗》《礼》为冠履，以《春秋》为襟带，以图史为佩服。”^{[5]387}有了这些积累和修养，才会写出有悦耳声响和文采鲜明的好文章来。对“无乎内而饰乎外”的为文之病，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5]508}他把“务富文采”“诬怪”“阔诞”的《国语》说是“用文锦覆陷阱”。柳宗元在《与吕道温论〈非国语〉书》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5]507}这是说文胜反伦，遮蔽圣人之道，害道也。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5]542}这里“以辞为工”是指柳宗元年轻时偏好韵文和骈体文。参加永贞革新，为倡行“大中之道”，柳宗元尊奉“文者以明道”；后来在永州十年，其文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为了明道而排斥“好辞工书”。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以明，辞假书以传，要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5]550}这是说，研究圣人之道不能只追求表面的文辞。

柳宗元认为，求道求辞不可偏废，二者相辅相成。求圣人之道，也要求圣人之辞。撇开道求辞不可，求道撇开辞也不可。这是说，道非虚器，而是有内容和实质的。施道及物，这是道之本质所在。今世人偏好文辞，夸耀著书，“粉泽以为工，遁密以为能”，这是脱离了道的本质。柳宗元追求的是“及物之道”，即惠及百姓，辅助时政之道。柳宗元批评的“好辞工书”二病，是当时一般读书人通病。他反对的是那些浮丽糜烂的害道之风，更重视明道的为文之功。柳宗元《报

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恣然尔，久则蔚然尔。”^{[5]547-548}柳宗元认为，品行是为文之本，“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古时圣人治理天下时，不用文章。后来周公遭变，仲尼不当世，才有文章传世。而历代士大夫都是穷困不得志时才著书，相习成了传统。柳宗元认为，这些以文名世的古人，在他们当时也是不为人所重的。今天自己遭贬蛮荒，既然“薄于当世”，那就让其“荣于后世”吧。在古文运动中，柳宗元赞韩愈为文的气势胜过汉代大文学家扬雄。韩愈心高气傲，从不在人前低头，但他独服柳宗元为人。韩愈和刘禹锡推崇柳宗元，称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之长。说到柳宗元，他为文的四句名言最值得称道。

（一）得之难与知之难

见《与友人论为文书》^{[5]510}，是柳宗元在永州因友人求索其文章有感而作的，通篇论说为文之难。柳宗元是文章大家，他自然深知为文的甘苦。柳宗元说：“古今号文章为难。”难在哪？难在“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这是说写文章有独到的见解难，而文章能被别人认识和理解更难。自古好文章难得，而好文章能让世人认知和体味其中的奥妙更难。不是文章高手，不是站在高处不会有这样的感慨。柳宗元说：为文如果有独到高明的见解，探究其精微深奥处，“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他认为，好文章如日月，如美玉，虽也会有瑕疵、芜败，但瑕不掩瑜，“芜败”不伤其价值。“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家家学习，人人奋进，殚精竭虑，将近千年。“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登文章之策，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柳宗元说自孔子以来，近千载，真正能登文章史籍的不过几十人而已。而人人争相“裂绮绣，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

下乎？率皆纵臾而不克，踟蹰而不进，力蹙势穷，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柳宗元慨叹道：道之显扬还是隐晦，与人遭遇的幸运或不幸相关联；人言论的善辩或迟钝，与官职升降相关联；名声的好坏，与人的好恶有关；文名伸取，与交际广不广有关。“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其见解能否适合时人的口味，这是难以预测的。“而又荣古虐今者，比肩迭迹，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柳宗元举例说，杨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著者哉！固有文不传于后祀，声遂绝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柳宗元认为，这些以文名世的古人，在他们生时也是不为人所重的。柳宗元这是借古喻今，慨叹和发泄自己遭贬蛮荒，其道不扬，其文难让人知晓和认识的愤慨。

（二）反对剽窃前作 戕害文史

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谈及为文时弊说：“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聒瞽瞍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这是说当时文人剽窃前人作品，戕害文史，从古书里挑取一些华辞丽句，放在嘴边炫耀。这些人一遇事便蜂拥而起，虚张声势，以假乱真，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欺蒙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以骗取一时之声誉。柳宗元对当时社会时弊的针砭可谓入木三分，触目鲜活尖锐，千百年后读来，仍如束束芒刺，从时空里跳出来，刺痛那些徒有虚名、弄虚作假的人。

（三）意尽言止

柳宗元《复杜温夫书》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即便止。”^{[5]553}此中“意即便止”语，虽仅四字，却道出了为文的重要法门。柳宗元毕生践行这一为文的原则。他在《与杨京兆凭书》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5]488}说到三代以下文章家典籍，他仅各用一字就将其精髓道破，其知文章利病之深远非常人可及。清代徐经《西汉文类序后》说：“殷、周之前，先圣删订，仅传数篇，何子厚不能知哉？今读虞、

夏史臣所记，典、谟、《禹贡》，炳如日星，烂若卿云，盖天道人事地利，莫不备具，后世史官，有数百卷不能尽者，是惟以数言括之，非简也。”古人数百卷不能说清楚的事，柳宗元仅几句话就说明白了。这需要知识渊博，体物精深，才能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细察《柳集》，柳宗元的文学名篇大都仅数百字，其字字珠玉，有如神来之笔，不像那些虚伪的文者，为文云里雾罩的，用些华辞丽句堆出一大堆垃圾，洋洋洒洒，不知说了些什么。柳文“简古”，这与柳宗元的学识和独特的人生遭遇和经历有关。

（四）反对随意立言

柳宗元《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5]502}这是说，做学问的人要想创立新的说法，必须读尽天下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在这里，柳宗元反对随便没来由地标新立异。以古鉴今，这好像也是在说我们今人做事。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学者，浅尝辄止，看书只读些皮毛，连古人的原著都没看过，也看不懂，就东拉西扯，胡乱发议论立言，害人害己，贻害无穷。这对年轻一代尤其有害，应引起世人的警觉和讨伐。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发奋读书，穷原竟委，成就了一代宗师。

三、韩愈以文为诗

诗从诞生起就是言情达志的载体。诗起自言语，也就是说话。《论语·季氏篇》孔子曾对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9]诗是用有韵短句组成的。古代语言不发达时，诗起于四言，后来五言，七言，以至创造出长短句的词。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说：“四言广于夏年（夏代）。 ”^{[5]19}自古韵句非歌者有之。远古人的诗像说话一样，没有后来那么多规矩和讲究。

可随着诗歌的文人化，讲求韵律、对偶、用典等逐渐形成了一套繁杂的诗歌体系。要在这个圈子里自由地畅达情志是很难的。程千帆对此有一段论述说：“魏晋以前，不论诗文，都是单复兼行，魏晋以来，有单趋复，对偶之外，又加声律，先是骈文出现，然后诗歌也由新变体发展成

今体律绝诗。就形式论，古诗近于古文，而律绝诗近于骈文。因此，以文为诗，古诗接受古文的影响易，而律、绝接受古文的影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困难。在古诗中，七言比起五言来，又本来更其富于流利、开张、曲折、顿挫这样一些笔法和章法，和古文相近。因而以文为诗，就可以使它本来具有的这样一些特点更加突出。”^[10]虽然诗文各有体，但两者的体式并非完全隔绝。唐代诗文是分化发展的。能文者未必能诗，能诗者也未必能文。而自古至今，能文者与能诗者是很难兼而一身的。柳宗元考唐初至中唐以来的文章沿革，及文人流派，在《杨评事文集后序》慨叹道：“文之难兼，斯亦甚矣。”^{[5]1095}其实早在唐初，就有人尝试过以文为诗，但都没有成功。

韩愈是古文大家，但他对骈文和韵体诗赋不甚专长，他用古文的气势写诗，却是很自然的事。韩愈《左迁蓝关示侄孙湘》诗：“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就是用为文的章法写就的。这是韩愈写得最值得称道的一首诗。诗写得大气，文从字顺，有声有色，但这只是韩诗的个别现象。韩愈以文为诗有两重含义，一是用古文的章法、句法为诗，一是以议论为诗。韩愈想用自己善古文的优势走出一条为诗的新路来，可是他没有成功。韩愈以文为诗，尤其是单纯用议论为诗，充分暴露了韩愈和后来宋代追随者的弱点。从文学史上看，诗文是传承的，但从文学体类上说，两者不是一回事。诗如果没有韵味，作诗不讲究章法，过于口语化，文章化，就失去了古诗的本色。尽管韩愈用他精通古文技艺作诗，顺势而为，可以理解。但诗有诗的体格，文有文的体格，韩愈以文为诗，把诗写得过于直白，口语化，少了韵味和意境，就丧失了古诗的本色，这终非古人之诗也。

我国早期的诗歌，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徒歌，是民众为了发泄内心的情绪脱口而出的。这时的诗有许多是感物事之作。沈德潜《古诗源》收录的古遗诗，有的只有一二句，二三句，掺杂不少俚语、谚语，透露出上古人生活的一些影子和人文道理。春秋战国时的民歌、童谣、俚语，像未雕琢的璞玉，有一种难于掩住的质朴感。情发于

声，声成文谓之音。古无所谓韵，韵即音之相应者。用现在的话说：诗发于情，“情发于声”。声韵相应，其和谐悦耳的诗文（包括赋）便成了一种像音乐一样美好的语言。白居易《与元九书》说：“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人。”^[1]虞、夏之民，儿童妇女，触物成讴，各言其志。其声韵交融，美妙天成。天籁之音。但后来起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的骈文，把韵文变味了。原本是从屈原辞赋演变来的骈文，由于一味讲究对仗和声律，到唐时成了只重形式、声韵的空架子。这时古逸诗质朴的传承不见了。

韩愈不善韵文，作古诗“以文为诗”，用文势助诗势。宋范晞文《对床夜语》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4]⁵⁹⁰韩愈自己在诗里说：“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他把诗当成文章末事，也就是有闲时才作的“余事”。韩愈作诗和为文一样，都是以气势宏伟取胜，其造语用典奇险，谈笑谐谑，这些都是他性格使然。韩愈是个率性而为的人，他不但用诗取笑别人，也作诗自嘲。他说自己：“腰腹空大”，“慢肤多汗”；“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齕”。这是说自己牙都掉光了，吃点东西就得反复漱口。还只能吃些软食烂饭，在嘴里磨嚼像牛反刍一样。韩愈“以文为诗”随处可见。许多时候，他不顾对仗平仄，直接用口语白话和长句子入诗。《泷吏》写韩愈再贬潮州，途经韶州境内的昌乐泷向小吏问潮州事，诗有曰：“不知官在朝，有益国家不？”这简直就是向小吏问话的直录。元和十一年，韩愈和卢云夫《曲江荷花行》诗说：“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末一句用了十三个字；《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说：“归来辛苦欲谁为？坐令再往之计堕眇茫。”第二句九字；五古诗《听颖师弹琴》说：“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末句为七字。这些寻常人肉眼也能看得出来。这不是韩愈诗的独创，如《诗经·邶风·七月》：“春日

迟迟，采芣苢。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里末句的六个字如口语白话。唐人崇古风，摹习为之恐是当时的平常事。柳宗元七言古诗《行路难三首》（其二）末二句说：“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才养育谁复论。”前句为十字。这是我们仅见的一处。诗过于直白，让人一眼望到底，没意境，少韵味，就太苍白了。没有形式美，缺少音乐美的语言，那就不叫诗歌了。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诗文各有体，韩（愈）以文为诗，杜（甫）以诗为文，故不工（精密，精巧）。”^[4]¹⁶⁷韩愈以文为诗历来都有争论，在北宋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韩诗并不受人重视。宋人追捧以文为诗是后来的事。但古诗到这时已经式微，渐渐失去了往日唐诗的风情和风貌。其实宋代诗坛的这种局面，与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是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变迁和发展，都必须遵循它内在架构和规律。社会发展了，文学也要变化。好的诗文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自古以来被人记住和喜欢的诗文大多都是这样的东西。白居易问诗于老姬是这样，韩愈以文为诗应该也是这样的探索。任何一种僵硬的文学体式，过于繁难的艺术手段，都会限制和影响艺术创作和发展。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生应该与此有关，韩愈倡行以文为诗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十三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768.
- [2]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愈[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 [4]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柳宗元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4.
- [6]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537.
-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78.
- [10]程千帆.俭腹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72.
- [11]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790.

（责任编辑：潘雁飞）